

“客话”漫谈

刘显钊

对南康话有所了解的人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当地居民日常讲的方言是白话，但其自称却是“客话”，这点与北海市其他同样以白话为母语的居民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客话”一称中的“客”具体所指是什么，“客”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便很值得研究。

“客”自然是与“土”相对的。“土”则很好理解，指的应该也就是今日北海市管辖范围内讲廉州话的居民。这点已为方言学界的调查成果所证实，陈晓锦在《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一书中就谈到：“廉州话的语言面貌相对于白话而言，要更为古老。”

可“客”却很容易引发歧义，对南康话情况并不了解的人们在乍一看到这一名称时，极容易联想到客家人。这是因为在近代以来的华南地区历史中，“土客冲突”一直是一个大事件。这虽不绝对，但绝大多数外来移民都是客家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本地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北海市的客家人对于自己方言的自称并非“客话”，而是“f话”。这一称呼的得名缘由是，客家话中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为“f”[ai45]。这就说明，“客话”一称中的“客”当另有所指。

对本地旧志有所涉猎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客”所指的是《廉州府志》记载中的“客户”，而“客户”指的应该是广府商人。事实上，不少地方文史工作人员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一观点被写入《合浦县志》及《北海市铁山港区志》中。不过，这两部志书中均未说明关于“客户”的记载出自哪个版本的《廉州府志》。经本人查询，这段关于“客户”的记载出自清道光版《廉州府志》“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

然而，这段记载并非一手史料，原文中便声称其摘录自《大清一统志》，而范翔宇在《廉州“俗有四民”及文化现象探究》一文中认为，这段记载最早见于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本人在使用“爱如生中国古籍基本库”检索后发现，现存史书中最早出现“俗有四民”记载的是明英宗天顺年间官修的《大明一统志》，其成书时间为1461年，比《广志绎》早136年。

但这可能仍非最早的出处，因为《大明一统志》中称其摘录自宋人的《合浦郡志》，同样收录“俗有四民”记载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大清一统志》则分别称其摘录自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廉州图经》。《太平寰宇记》至今仍有流传，经查询，内中并无这段记载。而《合浦郡志》及《廉州图经》今已散佚，无法得知其具体内容。

因此，这段记载所言并非清代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其记载的应该是宋元时期的情形。所以，客户所指的定非广府商人，而“客话”中的“客”也非古代记载中的“客户”。不过，虽然于论据上不甚准确，但“客话”中的“客”却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广府商人。因为陈晓锦的调查结果表明，现时的南康话相较廉州话而言，在语音特征上与广州话的相似度更高。而林亦在《广西的粤方言》一文中认为，如今广西沿江沿海地区与广州话较为相近的粤方言，多是“粤商入桂”的产物。

那么，广府商人是何时进入今日的北海地区的呢？史籍中并无明言。不过，清乾隆版《廉州府志》中就提到了清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府商人在廉州府地区活动的管理情况。可见，广府商人最晚在清雍正时期就已进入廉州。那么，南康一带的情况应该与之相差不大。而又根据北海市的行政沿革可知，清咸丰六年（1856年）后，负责采珠事务的珠场巡检司便由南康移驻北海，北海的地位日显。这也就意味着，南康的地位下降，而来此的商人必定随之减少。由此可见，广府商人进入南康的时间当是在清代前中期，今日南康话的前身即由他们所带来。

最后一个仍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为何进入南康的广府商人选择称自己的方言为“客话”，而不是广府话、白话或广东话？因为从“客话”一词的含义来看，它更像是一个他称，因此当我们发现其是作为一个自称而存在时，不免会有些费解，尤其是将其与北海市区居民的自称情况进行对比时。

囿于史料的匮乏，本人只能试做一个推测：“客话”一词很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他称，为当地居民对广府商人所说方言的称呼。而在南康的广府商人相对较少，其处于弱势地位，便默认了这一称呼。后又出于人际交往中的交互主观性需要，广府商人在自称中逐渐采用了这一说法，这点随着代际传递而被进一步强化。

至于北海市区的情况，则可能是因为广府商人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在自称中继续沿用两广地区更为常见的白话一称。当然，历史的真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后续研究的验证。